

山东评定“十差干部”冲击波

十名中层干部被评定为“最差”，在当地媒体上点名通报。新春伊始，山东省济宁市2008年“十差干部”的姓名在这个城市广为流传。沸沸扬扬的议论中，有对这一转变干部作风措施的肯定，也有对评定标准是否科学的质疑。

震动：“十差干部”出炉

执法人员乱罚款随口开价，有的查超载“大盖帽”一伸，司机就往里放钱……春节过后，济宁市召开的第一个全市干部大会是转变干部作风动员会，会上播放的一个个暗访镜头让在场的干部吃惊地张大了嘴巴。

更令人吃惊的是，会上不仅大张旗鼓表彰了“十佳”中层干部，而且通报了“十差干部”的名单，并随后在地方媒体上公布。“十差干部”大部分出自城建、税务、财政、交通、公安等部门。

“公开通报‘十差干部’的姓名、工作单位，从来没有过。”几位在现场参加会议的干部说，听着宣读名单，感觉到从未有过的震惊和震撼。济宁市交通局副局长书记鲍业军说，本局一名干部在会上被通报，但事先没有得到一点消息，直到听到这名干部的名字，才惊出一身汗。

针对转变干部作风，进行暗访、实时监督的是济宁市优化发展环境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干部作风建设年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两个机构。这“两办”与市纪委纠风办、投诉中心合署办公，专门受理、查处影响发展环境、干部作风存在的突出问题。

济宁市纪委监委、监察局副局长、优化办、作风办主任邓伟介绍，2008年初，济宁市确定开展全市干部作风建设年活动，评选“十佳十差”中层干部是其中一项内容。“我们想让广大干部和老百姓知道，政府转变干部作风动真格的了。”邓伟说，“尽管指名道姓地批评可能会对有些单位或个人带来不利影响，但是我们不怕丑外扬。”

争议：是不是打“死老虎”？

“十差干部”大多数出自执法部门，而且全部已经受到法律制裁和纪律处分，其中8人已经被司法机关介入调查，有的已被判刑；另两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

因此，有人认为，济宁拿已经被刑事判决或者涉及重大案件已被通报过的“原”干部来凑数，是在打“死老虎”，是一种“作秀”。如果真的决心惩治不良风气，为什么不从在任的干部中让百姓评“十差”？

邓伟解释说，“十佳干部”人选采取先由部门和县区推荐、后评选的方式；而“十差干部”人选让基层推荐难度很大，市优化办和作风办就从2008年市民举报、明察暗访查处的执法人员违纪事件以及纪检监察部门、公安机关、检察院等查办的有关案件中，初步筛选出16名候选人，经过初评大会投票，市委常委会研究，最终确定了“十差”。

他说，市优化办和作风办发现干部存在问题就会马上查处或进入司法程序，等到年底评定“十差”时这些干部已经被查处，这与“在任干部”中评定“十差”并不相悖。

“十差干部”之一的金乡县公路局路政科科长王立军（已判刑）就是被优化办、作风办查处而举发的。济宁市各路段运输车辆超载严重，接到群众举报后，优化办、作风办工作人员经过三天暗访，发现王立军收受贿赂放行通行的事实。优化办、作风办干部高希强说：“王立军收了钱就存银行，已经积累了不小的数额，当

时在他身上就发现一个高达几十万元的存折。”

如今，济宁城区各路段超载现象得到有效治理。不少运送沙石料的司机向记者反映，之前大家为利润争抢着多载，为了不被查出还要花钱买平安，现在执法人员公正执法，司机守规矩了，运送重量虽少但次数增多，不但心里踏实利润也增加了。

冲击：干部惊呼“狼来了”

尽管有争议，但“十差”评定对济宁广大干部的冲击之大仍出乎意料。一时间，机关干部惊呼“狼来了”，查干部作风动真格的了。

鲍业军说：“拿交通部门来说，尽管长期以来十分重视执法作风建设，但执法不规范现象难以杜绝。郝留柱被查处通报后，对交通部门广大干部是个警醒，今后绝不能再出现郝留柱这样的‘十差’干部了。”

郝留柱是济宁市交通路稽查支队一中队原负责人，在交通稽查中收受好处14次6万余元，将其中的2.3万元据为己有，其他分给他人。去年10月被检察机关立案查处，后被判处有期徒刑，缓期五年执行。

济宁市国税局干部韩枝华说：“‘十差干部’所犯

的都不是大案要案，他们是我们身边的干部，有些人我们都认识，这对广大中层干部的震撼更强烈。”

记者在济宁市交通、税务、统计等部门采访，很多干部认为，以前虽然各项规章制度也很健全，但是批评干部不点名不道姓，总有个别干部抱有侥幸心理。现在，优化办、作风办干部常常扮成当事人、纳税人和打官司的群众到各部门暗访，对干部的监督更有力了。

济宁市委书记孙守刚认为，干部是一个地方发展最重要的资源，干部作风是一个地方最重要的环境。时至今日仍有企业反映，有的项目审批还要盖100多个公章，跑60多个部门，没有两三个月下不来；据对济宁市360家企业调查，一年中企业与政府部门打交道时间一般在58天以上，而在杭州只需要6天；针对企业的乱检查、乱收费仍然屡禁不止。这些问题禁而不绝，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在干部作风建设上没下狠心，没有较真。治顽疾要出重拳。

思考：让干部对群众有足够的敬畏之感

长期关注干部队伍建设的政治学专家包心鉴认为，济宁市评“十差”的初衷值得肯定，但是评选的程序和效果值得商榷。“差”干部应该是不够党纪国法处理，但在执法为民、服务群众或廉洁自律方面，群众意见较大的干部。这十名干部都已经受到法律和党纪处理，已经不是“差”的问题了。

他说，当前关于干部监督管理的各项制度已经比较完善，要使制度真正落到实处，必须在干部优秀评选过程中让群众有真正的发言权。可以先设定干部优秀标准，让群众开门评选，干部只有对群众有足够的敬畏之感，才能把作风转变落到实处。

据了解，济宁市“十佳十差”中层干部评选活动将沿着让群众参与作风建设这个思路，进一步加大行政执法人员的监督力度，创新“差”干部评定形式，加大正反两个典型通报的力度。邓伟说：“目前正在计划实施市民监察团进机关，在干部作风建设方面，将加大群众监督力度，进一步扩大社会知情面和参与度。” 据新华社

一个地方政府家门口的百家讲坛

能容纳1000人的山西晋城泽州会堂座无虚席，连走廊上都站满了人。这一天，学者于丹的演讲题目是《儒道兼济，构建中国人格两岸》。面对晋城市的干部官员，她说人生就像一条河，一边河岸是儒，另一边河岸是道，生命的质量在于宽度而不是长度。

晋城是晋东南的一座新兴城市，东枕太行，南接中原。在文物大省山西，这里的旅游景点不算出名，交通也不算上特别便利。

名噪一时的于丹之所以会来到这里作一场不到两小时的演讲，缘于晋城市委组织部推行的一项干部学习制度。这项制度正式的名称为“干部教育专题讲座”，俗称“每月一讲”——每个月邀请一位全国著名专家前来演讲。

“每月一讲”的重点对象是晋城各县区的党政主要领导和市直正处级单位的一把手，要求每期必到，如有公务不到需向组织部门请假。在此基础上，根据每期讲座的内容，适当地扩大到其他副处级及以下干部。

从2005年6月推出第一讲以来，已有43位专家在晋城登台讲学——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俞孔坚、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刘福垣、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原所长周大地、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郁振、中央党校副校长石泰峰、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伟、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周海宏、作家王蒙、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北京社科院研究员阎崇年、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周其仁、国务院应急管理专家组组长闪淳昌等。

邀请专家讲学并非晋城首创，但是能够坚持近4年之久，而且始终保持质量，在全国并不多见。

“这是我们自己家门口的‘百家讲坛’。”“每月一讲”的忠实听众、晋城市副秘书长王二虎对记者说。专家的权威性增加了讲座的吸引力。一般情况下，讲座设在一个能容纳300人的会场，基本上会场爆满，稍微晚去一点就找不到位置。”晋城市委组织部干部教育科科长张韶华说，遇到一些明星学者，组织部门只能用发门票的形式来限制人数，“这时候真叫一票难求”。

一个人、一个民族需要培养自己的感性素质

为晋城干部“传道、授业、解惑”，是“每月一讲”发起人，晋城市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冯建平的话。

北大中文系教授郁振和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周海宏，就是抱着“传道”之心而来，只是一个从唐诗人手，一个从音乐人手。这两位教授都富有激情，生动而幽默，时常引起会场的阵阵笑声。

郁振一边念诗一边将诗句写在题板上，再投影到大屏幕上。他选的诗句除

了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外，也带有很强的思想内涵。

“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他讲解说，胡马就是北方的马，依恋北方吹来的风。越鸟就是南方的鸟，不管飞到哪里，筑窝的时候一定要筑在朝南的树枝上。禽兽尚且有故土之恋，何况人乎？

“这实际上是一种爱国主义的教育，告诉我们要热爱祖国，热爱祖国。”阳城县委书记刘爱军告诉记者。

周海宏则带领听众享受了一份音乐大餐，他的演讲长达3个小时，“打破了严肃音乐高不可攀的印象，听完之后意犹未尽。”刘爱军说。

周海宏一开篇就告诉听众“音乐何须懂”。他说，“一盘东坡肘子端上来了，你马上就想，这里面有什么深刻的思想内涵，我怎么吃不出来呢？”台下一阵笑声。他接着说：“你不用管那么多，感受那种纯粹的味觉的美，就是美食的欣赏方式，体验那种纯粹听觉的美就是音乐的欣赏方式。”

他一边播放音乐选段，一边打起节拍。“很多人不爱听严肃音乐的原因，就是觉得老也找不到旋律。”他说，其实，这是作曲家故意推迟旋律的到来，蓄积一种期待的力量，“等你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再给你，才能特别地激动。”

他由此谈及人生：“为什么现在生活越来越好的时候，你却发现人们的心情不是那么快乐呢？因为人的欲望无休止地随时都想到满足。”他说，因此要学会感受过程，“不会感受过程，人生不是垃圾就是苦等。”

当听众渐入佳境的时候，他将更大的人生道理和盘托出：一个人如果没有高品位的感性生活，就会在简单的感官愉悦上寻找出路，而简单的感官愉悦是容易腻的，于是吃了山珍海味吃珍稀动物，吃人乳宴、月饼饼，推而极之、赌博、吸毒，人生走向虚无。因此，一个人、一个民族需要培养自己的感性素质，“感性素质是获得幸福人生的条件。”

“整场讲座没有一个人走动，更没有一个人提前离场，”晋城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郭跃峰告诉记者，“啥叫茅塞顿开，这就是啊！”

为现实答疑解惑

43期讲座中，更多的是属于为现实答疑解惑的题材。其中有对中央重大决策的解读，有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分析，也有专门围绕晋城市自身建设与专设的讲座。

“题材尽可能广泛，不过总体来讲，经济的内容比例稍大。”郭跃峰说。由于主持的工作和所处的部门不同，干部们各有各的敏感点，不过均各有所得。

“周大地讲能源发展，他自始至终没有说‘清洁能源是发展方向’这样的话，但是他讲完后，我回来一想，他不就是这个意思吗。”刘爱军说，专家这种循循善诱的

方式，不说教，不灌输，非常有说服力。

一位专家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告诉干部如何应对媒体，他举南方某地一则命案为例，事件发生后，媒体蜂拥而至，当地政府非常明智，对记者进行妥当安置后，很快开新闻发布会，先由刑警队长发布情况，又请公安局副局长讲，半小时后又请公安局局长讲，最后由分管副市长讲。记者觉得当地政府很诚恳，反而树起了正面的形象。

刘爱军说：“现在的干部跟记者确实有心理隔阂，如何打破隔阂，专家用这个事例说明在突发事件面前，政府应当第一时间发出自己的声音，告诉社会真相，引导舆论。”

2008年底的最后一讲，由国务院应急管理专家组组长、国家减灾委专家委员会副主任闪淳昌主讲应急管理，这节课也令所有干部印象深刻。

闪淳昌从小处谈起。他说，很多人住进酒店，总是先看看哪里有歌厅，哪里有按摩，若打开电视在床上先躺一会，其实这都不对，第一件要做的事应该是看哪里有什么好书。

2008年初，南方遭遇冰雪灾害，广州火车站数十万乘客滞留，稍有异动，极可能酿成骚乱。形势紧急，怎么办？闪淳昌说，当时的一个办法就是让武警列队挤人群，将人群强行分隔。然后让人群沿着S行的轨道慢慢往前挪动，让他们感觉前面仍有希望，以避免心理浮动。

闪淳昌配以图片和视频讲解，一位干部听起来“惊心动魄”，并从中认识到危机管理是一门很高的学问。

干部的口味已经被培养出来

冯建平说，并不指望哪一次讲座听了之后立竿见影，“每月一讲”侧重的是培养干部的综合素质，“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只要坚持不懈，就一定会有成效”。

在冯建平看来，让晋城干部见识到，在我们的社会中，居然还有这么一批兼具学识魅力和人格魅力的人，这本身就是一种积极影响。

在各种干部培训方式中，这种方式应该是成本较少而成效较大的。冯建平说，去北大、清华办一个培训班，每个学员的费用就是五六千元，而且去的人有限。而“每月一讲”每年的经费也就是二三十万元，而且受益面很广。

让冯建平感到欣慰的是，在“每月一讲”的带动下，沁水县创办了“干部教育专题讲座”，阳城县创办了“阳城大讲堂”，泽州县创办了“思想解放在泽州论坛”。

冯建平告诉记者，“每月一讲”将长期继续下去。对于张韶华来说，邀请专家仍将是她今后的一项主要工作，虽然手头的专家资源越来越多，但这并不意味着以后会更容易，“因为干部的口味已经被培养出来了，请来的专家只能越来越好了。” 据新华社



时政点击

向总理致敬 为制度祈福

16日下午2点多，河北人李贵树夫妇因没钱医治身患白血病的儿子，决定放弃治疗。在天津火车站，他们偶遇结束在天津调研准备返京的温家宝总理。温总理得知情况后，当即指示将这2岁男童小瑞送京治疗。昨天上午，小瑞正式入住北京儿童医院血液病房接受治疗。（《京华时报》2月18日）

小瑞是不幸的，小小年纪就患上了白血病；而小瑞又是幸运的，他得到了温总理的关注和关爱，贫困下的生命无助重燃了希望的焰火。小瑞的不幸，是当前部分弱势群体生存现状的一个缩影，“无线医治决定放弃治疗”——再一次以直观的现实，让我们震撼于少数公民处在绝境中的挣扎与无助。而小瑞的幸运，又让我们不得不反思：能有几人像他这样幸运地遇到一国总理的意外关怀？

由此，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前不久引起舆论关注的“保命式犯罪”事件：听到自己被判决18年有期徒刑时，李大伟（化名）长舒了一口气。再次抢救，他做的就是这一刻。身患严重再生障碍性贫血的他，近日在北京清河999急救中心等来了专程前来宣判的法官。法官的宣判意味着——他能到监狱里免费治疗，保住性命。（《新京报》2008年11月26日）任何犯罪，都难脱法律严肃之刑罚，但这样一种“保命式犯罪”，却注定让法律尴尬，让公平和正义难堪。犯法其行可憎，可维护基本生存权又其行可悯——法律没有错，要保命也没有错，错的是什么呢？

当然，“保命式犯罪”只是一种极端的个例——在制度保障不健全的背景下，更多的人并没有危害社会，都如小瑞的父母一般进行了无奈痛苦下的“自我放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医院作为一个独立运营的经人，不能指望医院付出“免费医疗”。症结还是在于，我们的医疗制度体系中缺失一种面向底层群体的特殊医疗救治制度。故而，诸多处在危机状态的弱势群体，可以得到总理的关怀，可以获得富人的捐助，可以唤起社会的怜悯，但却很少能拥有及时而到位的制度救济。

无论在什么体制的社会中，总会有自救能力微弱的弱势群体，故而，社保体系对现代社会才显得尤为重要。可以说，保障所有公民（主要是穷人）的基本生命权，是社会公平的内在要求，也是公共管理的要义。从理论上讲，从社会公平的角度看，专门为面临生存危机者设立的“特殊救助制度”都不可或缺，政府有责任对每一位看不起病、面临生命威胁的公民实施救助。

因为一次感动，因为总理的心系民生，一个生命得到了拯救。这让人激动流泪，又让人心潮起伏——总理的指示和爱心总是“偶然”和有限的，只有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才是庇佑天下寒士的“救命稻草”。此时此刻，让我们向总理致敬，为制度祈福，一起期待这一天早日到来。 陈一舟

一种“非常愚昧”观点的辨析

世上原本就有愚昧的人，人愚昧的成因有很多，且不去说它。愚昧，在于愚昧的人缺乏知识，甚至于常识，在于其愚蠢而不明事理。有一点可以肯定，愚昧的人必说愚昧的话，有时听起来还振振有辞。

现在的房价高不高？北京华远集团董事长任志强认为并不高。从他的一贯言论来看，在其心理定位上，在其一直做特殊利益集团代言人的身份定位上，他会认定，房价高都不高。近日，他又利用其话语权，在2009年中国企业论坛上放言：以前报纸上很多教授说的“一个月的工资买不起一平方米的房子”的观点非常愚昧。（2月11日新华网）

任志强计算了一下，教授们愚昧到什么程度。他说，因为没有人可以想象，你为什么非要买一平方米的房子？如果你的工资买得起一平方米的房子，哪有那么便宜的房子？说任志强愚昧，他肯定不愿意，许多人也不会相信。以他在房地产业呼风唤雨的能力，以他在各类强势媒体强力扩张其特殊利益集团及共谋的话语权的本事，说他愚昧，

怎能服人？他的表现表明，他是揣着明白装愚昧。住房的合理价位应是什么？这有标准。当地工薪阶层月均工资能买得起一平方米住房，这是国际通例。任志强这种专业搞房子的人，不会不知道，他可能是以为别人都不知道。任志强也说，目前国际上公认的“合理的住房价格”的“房价收入比”为3至6倍，这是一个基本常识。但他算来算去，本土的房价与收入之间的比例却没有背离，非但没有背离，还低得很。这与诸多经济学家算出的本土现在的很多地方的房价收入比已到了几十倍的说法，相去甚远。

房价高与不高，正与任志强这样的人进行博弈的消费者有着切身的感受，受到任志强责难的有良知的教授们亦有理性的认知。从管理上说，房地产业本应形成完全竞争的机制，它所有的产品都有一个合理的市场价格并在市场上进行正当的交易，这也意味着不会有一家企业或一个消费者足以影响整个市场的价格。在这种环境下，市场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源，因此资本在经营时恰好位于其生产可能性边界

上，而且，怀有抱负怀有雄心，怀有社会良心，怀有社会责任的企业家，能够适应这样的完全竞争的环境，甚至于能如鱼得水。而本土的另一些房地产资本却不是这样，他们喜欢的是一种不完全竞争，就是说价格不能由市场说了算，而是要由资本来左右。因此才会有现实语境中的官商合谋，才会有他们哄抬房价的疯狂。

眼下，虽然有房地产资本喊“过冬”，但房价还是畸高，价格与价值还是不相匹配，所运行的价位依然超出了多数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就是说它并未得到市场消费基本面的支持。有人认为房地产业是个充满了不法与各类罪恶的畸形产业，这不是一种臆想，而是一种现实。可以这样讲，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不会尽退一些房地产资本的暴利意愿，作为一种市场的自行纠错，该有的“冬天”迟早会到来，只有那些尽一切力量做服务、做品质，谋取合理利润的企业家能够度过“严冬”，而一些心装另类机巧、幻想继续暴利的资本，将在阵阵“寒流”中适时地死掉。

今语

从俯卧撑到躲猫猫有多雷词代替真相

又是一个案件引发的流行语。上次是“俯卧撑”，这次是云南青年李乔明死在看守所，警方称其“躲猫猫”时撞墙（2月17日《今日早报》）。

“俯卧撑、打酱油、躲猫猫”等这些刚刚出现就大规模流行的网络热词，为什么如此受人追捧？其间折射出民生的一种怎样的社会心态？除了诙谐与幽默，还有没有一种无奈的沉重和辛酸？这几个问号，是接下来我们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

诸如“躲猫猫”之类的怪异词语之所以迅速走红和流行，其实是

在表达机制被堵塞后的一种非理性的宣泄而已。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所说：在我们的社会中，利益表达的渠道还是太狭窄，合法的社会抗议机制也太多，这样就很容易从忍受和沉默跳到温和或极端的反抗。而“躲猫猫”等词语的迅猛走红，正是一种既温和又极端的“抗议方式”。

“躲猫猫”迅猛走红再一次折射出的是公民正常表达机制的梗阻。事实上，如果政府信息公开再及时和透明一些，如果给予国民的表达

机制再畅通些，那么像“做俯卧撑”、“正龙拍虎”这种流行词就可能少一些甚至不会出现。这一系列被网友“造”出和流行的新词语，其所体现出的是坊间和公众对于社会诚信的拷问，公众对于真相苦苦索却不得，最后只能用“躲猫猫”等“雷词”来调侃、讽刺。

“躲猫猫”的流行，始于“真相”，只能止于真相，而且必须是详细的真相。否则，我们只能做着“俯卧撑”，躲着“猫猫”等待下一个雷词。

别让“中国盖茨”成为耀眼的流星

在“2008福布斯中国富豪榜”排名第53位的“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日前宣布，将曹氏家族持有的“福耀玻璃”股份的70%用来成立慈善基金，按该股17日收盘价6.49元计算，这部分股份价值将达43.8亿元。据悉，在“2008年胡润慈善榜”中，曹德旺以捐赠金额1.46亿元位居第14位。胡润表示，如果曹此举能落实，“他将成为中国最慷慨慈善富豪”。（《今日早报》2月18日）

曹德旺何许人也？实话实说，如果不是读到这则新闻，我真不知道这个名字，尽管他是中国有数的富豪。可现在我知道了，曹德旺是一个真正的大慈善家，长期对慈善公益事业投入巨大，即将成为“中国最慷慨的慈善家”。

曹德旺不是中国首富，可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中国最慷慨的慈善富豪。可见，富人能否行善，取决于财富心态。盖茨有这样的座右铭——“带钱入棺材，死也不光彩”。不仅盖茨，有名的慈善富豪巴菲特、钢铁大王卡内基，都持有类似的信仰。毫无疑问，曹德旺能走出个体慈善的这一步，根子也在于此。他的慷慨，让我们感动和振奋，由此也让我们看到了最高级的财富伦理存在于中国并不是什么虚幻的梦想——我们，也有堪比全身心投入的“中国盖茨”。

曹德旺“惊天捐赠”消息一出，舆论惊喜连连，无数人想不到，一位中国富豪竟然有如此之慈善豪气，激动地将曹德旺誉为“中国盖茨”。可能很多人都忘记了，其实在几年前以前，中国也出现了一个“最慷慨的慈善家”——余彭年。2006年4月11日，胡润2006中国慈善榜在北京公布，余彭年以20亿元的捐赠成为中国最慷慨的慈善家。当初，余彭年的善举感动了整个中国，可时过境迁之后，还有几个人记得这个老者、记得这个名字？或许，没有多久，今天的曹德旺就是昔日的余彭年，他们所遭遇的追捧和关注会很快速去，最终消失在公共视野。人们会遗忘这个名字，转而又会去对诸多富人的奢侈和私密之事，津津乐道。而现实的情况也正是如此，大众对富人寡善愤愤不平，但对富人大善却又缺乏持久的“热情”，不能不说，这是一种无言的悲哀。

大善无言，为善者当然不求名利。但我们之所以要给予大善者持续的关注、无限的敬仰，不是对于其个人的荣光，而是对于社会慈善事业的一种不懈倡导和努力认可。只有这样，“中国盖茨”才不会成为划过慈善天空的耀眼的流星，仅绚烂于一时；才会有无数的富人追随其后，前赴后继，将财富反哺社会进行到底。

从余彭年到曹德旺，时间跨度并不长。让我们永远记住这些大善无名的名字，是他们给了我们深深的希望。他们的慷慨需要成为推动慈善文化不断浴火重生的长效音符而不是“流行曲”，“中国盖茨”这项桂冠值得薪火相传。对此，我充满期待。 王艳